

【“一带一路”研究专题】

“一带一路”能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王金波

【摘要】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在全球场域下的整体呈现。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宏观叙事结构下，“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能否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对中国的叙事框定是有待回答的问题。作者基于2005-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数据，采用多期倍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家形象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与贸易、投资、双边政治关系、伙伴关系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一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对中国的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政体差异、外交立场等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以及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的优化、调节效应会有效缓解、改善一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消极感知和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及其对竞争性甚至敌意叙事的隐喻替代也会显著弱化一国对中国的负面推理、叙事框定以及与中国的身分和情感对立。中国应继续发挥和巩固“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叙事体系的正向作用，同时重新框定中美关系和解构中美战略叙事。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形象；软实力；叙事框定；中美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王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2.2.4～31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散，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的错误知觉、负面认知和地缘政治解读却给“一带一路”建设平添了许多杂音。^①“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经济侵略论”叙事框定下的“一带一路”与“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隐喻映射下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的战略焦虑和体系因素相互叠加，更是将中国与部分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良性互动塑造为“秩序之争”和“价值观之争”。^②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2021年甚至推出“重建美好世界(B3W)”计划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究竟是中国叙事中的和平、机遇之路还是西方话语中“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道路”？^③“一带一路”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能否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基于皮尤研究中心(PEW)2005-2020年“全球民意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多期倍分法(又称异时DID)和多层混合效应序次logistic回归(meologit)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国家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④也是一国综合实力或影响力在全球场域下的整体呈现。^⑤在影响一国国家形象或他者对该国叙事框定的诸多维度中，制度、文化、实力、经济相互依存和认知主体的个体特征是既有文献中常被提及的几类重要因素，而隐喻、叙事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一国自我

和他者形象的建构。不同影响因素对一国国家形象的影响机制或因果链条不尽相同;与之类似,不同叙事方式对一国国家形象的“图示”或“框定”也各有差异。

(一)制度、文化与中国国家形象的他者“镜像”

形象是认知的建构物,^⑥对他者形象的图示、框定和塑造“总是隐含着自我价值的投射”。^⑦在影响一国公众对他国认知、感知、图示和框定的诸多因素中,制度、文化、规则、规范和观念等体系层次因素不仅决定国家的身份、利益和行为,还塑造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以及个体间的集体认同和战略偏好,对个体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观甚至情感因素也会产生潜在和持久的影响。^⑧而国家在身份、利益和行为逻辑等方面的差异又会限制国家间的互动、规范的扩散和内化过程。理论上,国家间反复的互动可以演变出合作,而反复的合作性互动又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性观念、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制度化。^⑨同样,个体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观甚至情感因素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对“群我”意识的形成、“我一他”关系的界定、他者形象的框定(尤其是刻板印象的形成)和更广泛的社会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⑩从框架理论(frame theory)来看,个体用以诠释、定义、呈现社会现实的架构和将社会现实通过符号内化成为主观认知的过程,会对他者形象的具象和在拟态环境中的呈现与社会建构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⑪基于建构主义和框架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做出如下假设:与中国的制度、文化、政体差异会显著影响一国对中国的正向认可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二)经济相互依存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国家形象由自塑(“我形象”)和他塑(他者“镜像”)两部分构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在国际关系网络中心性的提升,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和良性关系的累积在理论上也会对中国与一国的关系、一国对中国的感知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起到促进作用。

经济相互依存如何塑造国家关系?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⑫建构主义主张,经济相互依存可以通过互构身份产生“群我”意识和集体认同,从而促进国家间合作与和平。^⑬现实主义也承认,相互依存虽然不能阻止冲突,却会提高冲突的代价或降低政策性冲突复发的可能性。^⑭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也发现,与中国密切的贸易、投资联系会显著提升相关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外交立场一致性和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⑮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反过来又会对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产生正向的激励和促进作用。^⑯虽然也有研究发现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中国的正面评价,^⑰但总体而言,与中国密切的贸易、投资、政治、军事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还是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话语建构、隐喻推理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叙事框定

国家形象不仅取决于具象的物质性力量和文化、观念等软性因素,还与认知主体的话语建构、隐喻推理和叙事结构密切相关。话语建构主义认为,话语可以建构社会存在。^⑱后建构主义强调,话语可以建构身份。^⑲后结构主义主张,话语会建构话语秩序、改变社会结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提出,“话语即权力”。^⑳政治心理学也主张,话语可以改变人们对行为体的形象认知,进而构建出不同的政治现实。^㉑

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叙事是对历史、文化、时代重要事件或现象的描述,是一种集体共情。^㉒叙事在解释、说明或体现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重要公共信念和公众普遍价值认同的同时,还可以将事实背后更加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纳入可感知的范畴。^㉓基于叙事独具的说服、关联作用和深层建构性,在国际关系领域,合理的战略叙事有助于“降低战略成本、推进安全化框定和提升战略说服能力”,^㉔而竞争性或对抗性的叙事框定和负

面推理不仅会强化一国对另一国的威胁感知,还会加剧两国间的身份对立甚至情感对立。^②

以美国对中国的叙事框定为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宏观叙事结构下,美国首先通过“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类比叙事,不断强化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内部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和建构。^③其次,通过对比叙事不断加剧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三个层面的身份对立,在将美国霸主地位的不确定性归咎于他者特别是中国的同时,^④还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叙事框定为“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较量”,^⑤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两国公众的情感对立。最后,通过反叙事不断解构、消解“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和议程中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可信性,诋毁中国国家形象。^⑥基于话语建构主义、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叙事,不难推出,一国对中国的话语建构和隐喻推理会显著影响该国对中国的叙事框定。

(四)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建构”

体系层次上的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间的实力分布)是结构现实主义最核心的自变量。^⑦同样,在中国快速发展尤其是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理论上,决定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首要自变量一定也是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在本文的样本期间(2005–2020年),中美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代理变量的经济实力之比2014年首次超过60%,2020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2%,正在快速接近权力转移理论80%的权力持平标准;^⑧以军事支出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代理变量的中美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之比也分别由2005年的8.62%、37.61%上升至2020年的32.42%和40.48%。^⑨同期,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评价的比例则由2005年的35%上升至2020年的73%,^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比例分别上升至2020年的47%和67%。^⑪相应地,美国的对华战略也从早期的“接触+演变”“接触+防范”“接触+规制”演

变为目前的遏制或制衡。至少从时间节点而言,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和负面评价比例的上升以及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到遏制的演变与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高度相关。

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不仅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叙事和对中国的“威胁建构”,^⑫还加大了体系内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还是对冲的难度。^⑬中美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不仅显著使美国国内对“中国威胁”迅速形成共识,对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风险态度也产生了明确影响,符合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⑭美国国内不同群体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中国威胁”认知的迅速趋同不仅显著影响着美国核心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对“中国威胁”的评估和对华战略的基本取向,^⑮还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体系内其他国家对中国

三、“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第一,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的贸易创造效应、^⑯投资促进效应、^⑰产业聚集效应(价值链优化效应)、^⑱空间溢出效应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公共产品属性^⑲在为相关国家提供更多市场、投资和增长机遇的同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我形象”和他者“镜像”均会产生值得期待的正向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与大部分国家发展阶段的高度契合,^⑳会对相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身份认同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㉑不仅如此“一带一路”的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双边政治关系等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在有效提高一国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一致性和对中国正向认可的同时,还会对“债务陷阱论”“经济侵略论”形成“反叙事”进而弱化、解构甚至消解这些敌意叙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第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伙伴关系、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便利化(投资协定)、货币互换

协议和资金融通进程会显著提升一国与中国“直接而可靠的社会关系”和该国对中国的正面印象。随着“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散和被国际社会的逐渐接纳以及中国在国际关系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性权力的上升,与中国直接而可靠的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伙伴关系)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伙伴国与中国之间资源和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和实效性,^⑤还有助于提升伙伴国在现有国际关系网络中的“接近中心性”和“从网络其他节点间获取/控制信息和资源的能力与便利程度”。^⑥而与中国日益频繁的资源传递和事件互动在重塑伙伴国与中国的关系结构和行动逻辑的同时,对现有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网络体系和美国的中心性、结构性权力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由于一国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不仅取决于该国自身的网络中心性,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网络中心性,伙伴国的双重身份(既与中国保持外交伙伴关系也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因此也会对该国获取网络信息、资源的能力与中国的社会关系产生显著影响。^⑦实证研究发现,伙伴关系会显著提升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信性、重点议题的可控性和伙伴国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一致性;^⑧货币互换协议、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在有效减轻相互依存网络的不对称性的同时,^⑨也会显著提升伙伴国对中国的认同、互信和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一致性即赫希曼效应。^⑩随着“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网络化和伙伴国与中国的接近中心性的提升,“一带一路”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化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也会显著提升相关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和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一致性或与中国一致的政策偏好,进而改善、提升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对中国的认知、感知与正面评价。

第三,基于叙事、隐喻独具的说服、关联作用和深层建构性,“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和对竞争性甚至敌意叙事的隐喻替代、话语建构(规则重建、关

系重塑、语境重构)也会显著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和叙事框定。作为一种更为具体和微观的叙事策略,隐喻是一种跨概念域即从源域到靶域的相似性(关系相似、特性相似)映射。^⑪隐喻不仅可以通过选择性的意义建构启动观众预设、框定议题,还可以通过负面推理激起对相同事件的不同理解甚至冲突。^⑫具体到“一带一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或和中国有地缘冲突的地区大国将“债务陷阱”“经济侵略”“新殖民主义”等源域的典型特征投射到“一带一路”及其行为主体中国身上,从而选择性地建构出“一带一路”甚至整个中国的负面形象。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论”类比叙事下的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将中美矛盾塑造为秩序和权力之争一样,“债务陷阱论”等隐喻建构下的“一带一路”和中国国家形象必然也是负面的。针对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敌意叙事和负面推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首先以正面回应的方式明确否定了“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其次,提出替代隐喻,以“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债务陷阱”等对“一带一路”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与叙事框定。最后,通过规则重建、关系重塑和语境重构赋予“一带一路”新的语境、认知框架和含义。^⑬在降低部分国家、地区和群体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的同时,有效提升这些国家、地区、群体与中国的集体共情和对中国的认同。

第四,“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观念)、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立场等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改善这些变量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叙事框定为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之所以从早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战略竞争对手”转变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⑭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作为施动者参与国际规范重塑或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这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与非西方权力及观念的

相对比例”。^⑤拜登政府之所以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并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⑥其根源在于美国的权力优势与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具象的物质性力量变化，还取决于体系内其他成员(包括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规范与观念的内化程度。^⑦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的隐喻推理和叙事框定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两个文化实体或两个社会间的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中美两国间相对实力的变化”。^⑧由于美国并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政体差异等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可能无法直接消解美国对中国的他者化或与中国的身份对立，但可以拉近“一带一路”伙伴国与中国的距离，弱化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情感对立、敌意叙事和负面推理。

第五，“一带一路”与中美权力变化的交互效应和对威胁认知的优化效应会显著弱化、改善体系压力 and 一国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和中美战略竞争(包括数字领域竞争)加剧不仅强化了美国的“地位焦虑”和对中国的“敌意螺旋”，^⑨也强化了体系内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对中国实力的感知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⑩正是一国对中国实力的错误感知(而非真实的实力分布)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加剧了一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甚至敌意叙事，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又与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相互叠加，进一步强化了一国对中国的“敌意螺旋”和制衡(权力制衡、威胁制衡)意愿。^⑪基于“一带一路”合作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一带一路”与中美权力变化的交互效应在有效缓解一国对中国实力的错误感知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的同时，还会有效缓解一国因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所面临的体系压力以及在中美两国间的选择困境，显著弱化、

改善体系压力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图1给出了本文的逻辑框架，据此，本文可以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1：“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中介(调节)效应会显著提升相关国家公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假设2：“一带一路”会显著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和叙事框定。

假设3：“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政体差异等距离变量和与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等体系变量的交互效应会显著弱化一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或消极感知，显著改善这些负面或反向因素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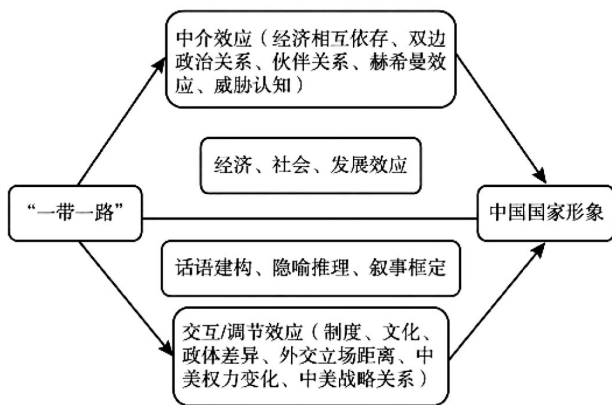


图1 “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数据和变量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数据库中“对中国的印象”这一指标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代理变量。^⑫在具体问卷调查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受访者(每个国家分层抽样选取1000个左右的样本)被要求在“印象非常正面”“比较正面”“比较负面”和“非常负面”中选择一项。为方便回归系数的解释、比较和便于理解，本文对该问题的回答进行了逆向和标准化处理：逆向处理后，“非常正面”“比较正面”分别赋值4和3“比较负面”“非常负面”分别赋值2和1；标

准化处理后,该变量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样本总计涵盖16年(2005-2020年)60个国家(其中39个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91347个国家一个体一年份观测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的样本期间,部分发达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呈持续上升之势。其中,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评价的比例由2006年区间最低点的29%上升至2020年的73%,创下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最高值;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则由2006年区间峰值的52%下降至2020年的22%(如图2)。值得忧虑的是,美国国内持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正在趋向一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持负面评价的比例分别由2005年的34%和39%上升至2020年的62%和72%,^⑤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已经成为两党共识。同期,以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DEL)项目戈德斯坦分值

(Goldstein score)年度均值为测度的中美关系也由2005年峰值的0.9978下降至2020年的0.0442。^⑥至少就时间节点而言,美国公众对中国负面(正面)评价的上升(下降)与中美关系的走低高度契合,中美关系的恶化则与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高度相关。

(二)核心解释变量

1.“一带一路”: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1,否则为0。^⑥

2.政策时间点: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在2013年秋季,本文取2014年以后的年份为试验期,2014年及以后一国若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控制变量

1.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文采用GDEL项目一国对中国事件的Goldstein年度均值衡量该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⑥外交伙伴关系用来测度一国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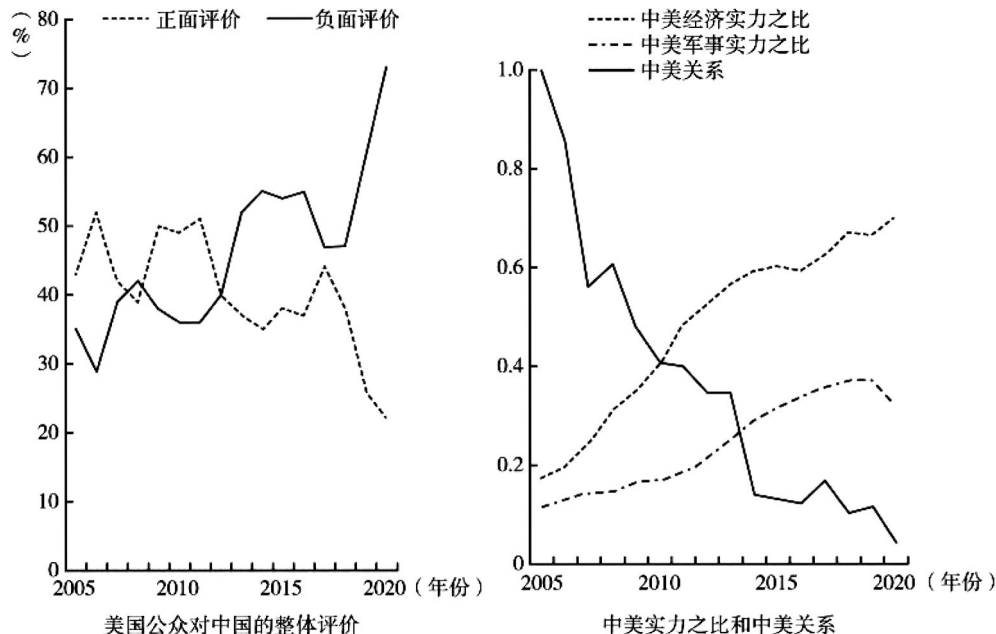


图2 2005-2020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评价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数据、GDEL和WDI相关数据制成。其中,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评价数据来自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set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中美关系数据来自The GDEL Project "GDEL 1.0 Event Database," <http://data.gdelproject.org/events/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中美经济实力之比、军事实力之比数据来自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中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层次性,其中伙伴关系赋值为1、战略伙伴关系为2、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3、中国—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4、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赋值为5。^⑥是否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用来衡量一国与中国经济伙伴关系的互惠性、全面性和制度化水平。^⑦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投资依存度用来衡量一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⑧来自中国的武器进口额(对数值)用来衡量一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⑨联合国大会投票差异用来衡量一国与中国在外交立场上的距离。^⑩军事争端(虚拟变量)用来测度一国与中国的冲突情况;^⑪历史在理论上会影响集体预期,对冲突的集体记忆也会影响一国对他国的认知。^⑫与中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和政体相似度用来测度一国与中国在制度、文化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⑬

2. 国家层面特征变量:(1)政体类型用来测度一国与他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差异,取值范围在(-10,10)区间,数值越大代表该国越接近西方民主政体;(2)政府稳定性,用来测度一国的选举政治对稳定政策预期的影响;^⑭(3)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用来测度一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和制衡的可能性;^⑮(4)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富裕程度或内部制衡的能力;(5)失业率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情况。^⑯

3. 个体层面特征变量:除了与一国国家形象相关的问题外,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还涵盖了一系列完整度较高的与受访者有关的个体层面信息(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政党倾向等),这些信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也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本文的实证检验。^⑰受认知能力和所处环境所限,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阶层的群体对一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也存在一定差异。^⑱

4. 相关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具体包括:一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⑲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差异

即外交立场距离;^⑳与美国的贸易联系、投资联系、军事联系和同盟关系,^㉑用来衡量相关国家在政治、安全、外交、经济领域与美国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在中美实力差距日渐缩小、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各国与主导国美国的关系也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中国的评价。

5. 体系因素:本文采用GDELT项目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事件的Goldstein年度均值来衡量中美战略关系;在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本身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烈度。^㉒本文还采用中美两国的GDP之比、军事支出之比和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理变量的科技实力之比衡量一国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对威胁的认知。^㉓

五、“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数据,接下来本文采用多期倍分法和多层混合效应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选取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39个国家为处理组,未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21个国家为对照组,采用多期倍分法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y_{ijt} = \alpha + \beta BRI_i \times post_{it} + \gamma X_{it} + \lambda W_{ijt} + \delta_i + \et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text{式1}$$

其中, y_{ijt} 表示国家*i*个体*j*在年份*t*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α 为截距项。 BRI 为虚拟变量,受访者所在国*i*若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1,否则为0; $post_{it}$ 为政策时间点(“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签署年份)的虚拟变量,2014年及以后一国若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1,反之为0;系数 β 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实施效应,如果系数 β 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会显著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X_{it} 为体系和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国家*i*与中国的关系、国家*i*与美国的关系、体系因素和国家*i*的一些自身特征; g 为体系和

表1 “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多期倍分法基准回归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132*** (0.007)	0.126*** (0.007)	0.099*** (0.007)	0.094*** (0.008)	0.053*** (0.011)
与中国的贸易联系		1.939*** (0.163)	1.568*** (0.164)	0.844*** (0.177)	1.038*** (0.195)
与中国的投资联系		0.835*** (0.140)	1.277*** (0.146)	1.838*** (0.163)	1.938*** (0.171)
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0.108*** (0.006)	0.097*** (0.006)	0.105*** (0.006)	0.091*** (0.006)
与中国的军事联系		0.016*** (0.002)	0.018*** (0.002)	0.025*** (0.002)	0.024*** (0.002)
自由贸易协定			-0.104*** (0.009)	-0.103*** (0.010)	-0.109*** (0.011)
双边投资协定			0.099*** (0.009)	0.152*** (0.010)	0.200*** (0.013)
货币互换协议			0.033*** (0.008)	0.024*** (0.009)	0.030*** (0.010)
外交伙伴关系			0.017*** (0.003)	0.011*** (0.004)	0.007* (0.004)
与中国的制度距离				-0.118*** (0.006)	-0.103*** (0.008)
与中国的文化距离				-0.014*** (0.002)	-0.002* (0.003)
与中国的政体差异				-0.009*** (0.001)	-0.012*** (0.001)
与中国的外交立场距离				-0.059*** (0.011)	-0.020* (0.012)
与中国的军事冲突				-0.041*** (0.009)	-0.036*** (0.012)
中美经济实力之比					2.359*** (0.304)
中美军事实力之比					-3.003*** (0.480)
中美科技实力之比					-0.975*** (0.324)
中美战略关系					-0.556* (0.250)
与美国的贸易联系					-0.374*** (0.053)
与美国的投资联系					-0.168*** (0.035)
与美国的军事联系					-0.012*** (0.001)
与美国的外交立场距离					0.109*** (0.014)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1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91347	377452	377452	377452	362205
R ²	0.182	0.174	0.174	0.175	0.17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外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W_{ijt} 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i*和个体*j*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 β 为个体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δ_t 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了时间层面的冲击; η_i 为国家固定效应,控制了所有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结果估计的影响; ε_{ijt} 为误差项。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1 报告了以“一带一路”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因素的多期倍分法和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基准计量结果。^⑤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的系数即“一带一路”的政策效应在所有模型中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会显著提升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符合理论和政策预期,与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的叙事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我形象”高度契合。

在控制变量中,与中国的贸易、投资、政治和军事联系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与美国的贸易、投资和军事联系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与中国(美国)的良好、密切的政治、经济 and 军事联系会显著提升(降低)一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该结果符合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也符合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货币互换协议、外交伙伴关系与一国对中国的评价显著正相关,符合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预期;不过,与预期相反的是,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有效提升一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⑥其他控制变量中,与中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政体差异、外交立场距离、军事冲突系数均显著为负。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一国与中国在观念、规范、身份认同等更深层次的差异均会对一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框定和建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差异越大其对中国产生错误知觉和刻板印象的可能性就越大。政体差异、外交立场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一国与中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立场上的差异也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军事冲突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历史因素和对军事冲突的集体记忆也会影响一国对中国的集体预期和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就本文的实证结果而言,一国若与中国有过军事冲突会显著降低该国对中国的正面印象。

在体系因素中,中美军事、科技实力之比和中美战略关系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中美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会显著加大体系内其他国家对中国负面评价,而中美关系恶化、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也会对中国的大国形象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这一经验事实意味着实力变化带来的相对地位模糊不仅会加大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甚至冲突的概率,还会加大体系内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感知、错误知觉和冲突的可能性。^⑦值得注意的是,中美经济实力之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并未降低其他国家对中国正面评价,反而显著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⑧

(三)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且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禀赋各不相同,对中国的认知也各有差异。下页表 2 报告了国家层面异质性对中国国家形象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国家收入水平来看,“一带一路”

表2 国家层面异质性与“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变量	国家收入水平		国家地理位置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与中亚地区	中东与非洲地区	南亚地区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229*** (0.031)	0.081*** (0.011)	-0.116*** (0.014)	0.109*** (0.011)	0.123*** (0.013)	-0.053** (0.022)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62205	362205	362205	362205	362205	362205
R ²	0.179	0.179	0.179	0.179	0.179	0.17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均会显著提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但对低收入国家的正向作用显著高于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欧洲、中亚、中东与非洲地区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要比亚太和南亚地区更加积极。亚太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亚太地区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体系压力的增大不仅加大了地区各国在中美之间战略和外交选择的难度,还削弱了“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正向作用。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亚太地区以规则为导向的竞争性区域合作进程和美、日等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显著性。同样,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大国,其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中印边

境冲突的加剧、中印关系的恶化和美国“印太战略”相互叠加不仅大幅抵消了“一带一路”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正向作用,也加大了整个南亚地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国家形象既受宏观因素(如国家实力、文化等)影响,还与认知主体的个体特征(所处环境、知识背景、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等)密切相关。表3给出了个体层面特征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显著降低了相关国家女性、50岁及以上群体、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群体对中国的评价,显著提升了相关国家男性、50岁以下群体、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群体对中国的评价。“一带一路”与共建国家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

表3 个体层面异质性与“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变量	性别差异		年龄差异			受教育水平		收入水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女性	男性	30岁及以下	30—50岁	50岁及以上	大于中位数	小于中位数	大于中位数	小于中位数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079*** (0.014)	0.077*** (0.014)	0.033* (0.017)	0.025* (0.015)	-0.038*** (0.014)	0.038*** (0.014)	-0.039*** (0.014)	0.038*** (0.014)	-0.042*** (0.014)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36123	136123	136123	136123	136123	136123	136123	136123	136123
R ²	0.170	0.170	0.170	0.170	0.170	0.170	0.170	0.170	0.17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较高群体对中国的评价显著正相关,这一经验事实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或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该国公众更加客观评价中国快速发展这一事实,符合经济学、社会学的直觉和逻辑推理。

由于本文多期倍分法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在标准化处理之前为离散变量,为避免离散变量标准化处理为连续变量后可能存在的稳健性和异方差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多层混合效应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稳健性检验。^⑩如表4所示,“一带一路”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1多期倍分法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表1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六、“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机制考察

(一)中介效应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表5对“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了共建国家以人均GDP为代理变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投资、政治联系,显著降低了共建国家与中国的外交立场距离(赫希曼效应)。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可以通过影响共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这些国

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感知,也可以通过贸易、投资、双边政治关系和外交立场一致性等中介变量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評價。Sobel 检验(P 值在 1%水平上显著)、Bootstrap 检验结果(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也表明,这些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非常显著。

(二)交互(调节)效应

表6进一步采用三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观念)、政体(意识形态)差异、外交立场距离和历史因素(有无军事冲突)等影响一国公众对中国认知和感知变量的交互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与这些认知距离变量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一带一路”与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一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观念)差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差异、外交立场距离和历史因素等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三)中美战略竞争与“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美战略竞争叙事下“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引入以下变量:(1)一国与中美两国的贸易、投资和军事联系,用来衡量一国在经济、军事领域与中美两国关系的相

表4 “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meoligit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一带一路”× 政策时间点	0.263*** (0.068)	0.252*** (0.067)	0.199*** (0.068)	0.180** (0.070)	0.078* (0.096)
分位点1	-2.667*** (0.126)	-2.245*** (0.148)	-2.205*** (0.147)	-2.382*** (0.237)	-1.995*** (0.436)
分位点2	-1.035*** (0.126)	-0.629*** (0.148)	-0.589*** (0.147)	-0.766*** (0.237)	-0.382 (0.436)
分位点3	1.233*** (0.126)	1.638*** (0.148)	1.678*** (0.147)	1.501*** (0.237)	1.881*** (0.4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91347	377452	377452	377452	36220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模型1—5与表1模型1—5一一对应。

表5 “一带一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传导机制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路径 A	因变量	中国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1320*** (0.0068)	0.1320*** (0.0068)	0.1320*** (0.0068)	0.1320*** (0.0068)	0.1320*** (0.0068)
	观测值	391347	391347	391347	391347	391347
	R ²	0.1820	0.1820	0.1820	0.1820	0.1820
路径 B	因变量	人均 GDP	贸易联系	投资联系	政治关系	外交立场距离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0650*** (0.0009)	0.0130*** (0.0001)	0.0070*** (0.0001)	0.1060*** (0.0044)	-0.1490*** (0.0028)
	观测值	391347	391347	377452	391347	391347
	R ²	0.9990	0.9540	0.8220	0.5310	0.7510
路径 C	因变量	中国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1280*** (0.0069)	0.1230*** (0.0070)	0.1150*** (0.0071)	0.1250*** (0.0068)	0.1280*** (0.0069)
	人均 GDP	0.0760*** (0.0120)				
	贸易联系		0.6760*** (0.0881)			
	投资联系			1.0590*** (0.1350)		
	政治关系				0.0740*** (0.0026)	
	外交立场距离					-0.0280*** (0.0035)
	观测值	391347	391347	377452	391347	391347
	R ²	0.1820	0.1820	0.1720	0.1830	0.1820
Sobel 检验 P 值		7.0510×10 ⁻¹⁰	4.8850×10 ⁻¹⁵	7.9940×10 ⁻¹⁵	0	2.4420×10 ⁻¹⁵
Bootstrap 检验 95%CI		(0.2173, 0.2256)	(0.1900, 0.1976)	(0.0893, 0.0946)	(0.0308, 0.0337)	(-0.0959, -0.0914)
中介效应占比(%)		3.7128	6.8501	6.1211	5.9094	3.153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路径 A 不含中介因子,路径 B 为中介因子检验,路径 C 含中介因子;***、*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对距离;^②(2)一国与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用来衡量一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侧重和在中美之间的“有向”选择;^③(3)一国在中美两国间的对冲倾向,用来衡量一国与中美两个大国的等距离/非等距离关系;^④(4)一国与中美两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政体差异和外交立场距离,用来衡量一国与中美两国在制度、文化、政体(意识形态)和外交立场等方面的相对差异;^⑤(5)与中美两国的伙伴(同盟)关系,用来考察双重身份(既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也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表7报告了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多期倍分法和三重差分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其一“一带一路”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会显著优化和改善体系压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其二,一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投资联系、政治关系(侧重外交)和军事联系越密切,或与美国的相对联系越疏远,其对中国的评价就越积极。其三,双重身份(既是美国盟友又是中国的伙伴国)并未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结果

表6 “一带一路”的交互效应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199*** (0.015)	0.146*** (0.009)	0.592*** (0.035)	0.169*** (0.016)	0.159*** (0.010)
“一带一路”×制度距离×政策时间点	-0.099*** (0.016)				
“一带一路”×文化距离×政策时间点		-0.022*** (0.003)			
“一带一路”×政体差异×政策时间点			-0.032*** (0.002)		
“一带一路”×外交立场距离× 政策时间点				-0.034*** (0.012)	
“一带一路”×军事冲突×政策时间点					-0.069*** (0.014)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34947	334947	334947	334947	334947
R ²	0.195	0.195	0.195	0.195	0.195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7 中美战略竞争与“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一带一路”×政策时间点	0.132*** (0.007)	0.093*** (0.007)	0.091 (0.007)	0.109*** (0.008)	1.240*** (0.337)
与中美两国的贸易联系		1.024*** (0.112)	1.004*** (0.112)	0.732*** (0.117)	0.673*** (0.124)
与中美两国的投资联系		0.230*** (0.022)	0.228*** (0.022)	0.118*** (0.027)	0.120*** (0.028)
与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		0.074*** (0.006)	0.075*** (0.006)	0.082*** (0.006)	0.111*** (0.007)
与中美两国的军事联系		0.013*** (0.001)	0.014*** (0.001)	0.017*** (0.001)	0.017*** (0.001)
与中美两国的伙伴(同盟)关系			0.052*** (0.011)	0.042*** (0.011)	0.037*** (0.011)
与中美两国的制度距离				-0.043*** (0.004)	-0.042*** (0.004)
与中美两国的文化距离				-0.019*** (0.002)	-0.020*** (0.002)
与中美两国的政体差异				-0.002*** (0.001)	-0.002*** (0.001)
与中美两国的外交立场距离				-0.048*** (0.007)	-0.049*** (0.008)
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对冲倾向					-0.026*** (0.004)
“一带一路”×中美经济实力之比×政策时间点					1.292*** (0.271)

续表 7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一带一路”×中美军事实力之比×政策时间点					-2.073*** (0.509)
“一带一路”×中美科技实力之比×政策时间点					-2.725*** (0.799)
“一带一路”×中美战略关系×政策时间点					-0.655*** (0.197)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91347	361248	361248	361248	361248
R ²	0.182	0.177	0.177	0.178	0.17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明,一国身为美国的盟友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与中国的疏远或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身为中国的伙伴国也不必然意味着其与美国的疏远或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其四,一国与中国在制度、文化、政治体制和外交立场等方面的相对距离越小或与美国的相对距离越大,其对中国的叙事和框定就越正面。其五,“一带一路”与中美军事实力之比、中美科技实力之比、中美战略关系的三重差分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一带一路”与中美权力变化和中美战略关系的交互效应会显著改善一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显著弱化体系压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实力之比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会显著强化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向作用。其六,一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对冲或两面下注的倾向越大,其对中国的评价就越积极。一种极端的情景是,一国若与中美两国保持相等距离或等距接触,其对中国的评价最正面。反之,一国若对美国采取追随战略或对中国采取制衡战略的倾向越明显,其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消极。另一种极端的情景是,一国若对美国采取一边倒或完全追随战略,其对中国的态度最消极。值得注意的是,一国若对中国采取追随战略或完全倾向于中国并不必然会提高该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体系压力和来自美国的压力依然会对该国对中国的认知、该国对中国国家形象

的叙事框定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

七、结论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基于皮尤研究中心 2005-2020 年“全球民意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多期倍分法和多层混合效应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其一,“一带一路”会显著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其二,一国与中国密切的政治、贸易、投资和军事联系也会显著提升该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其三,一国与中国的制度、文化、政治体制和外交立场距离越大,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就越显著。其四,双边投资协定、货币互换协议和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的国家形象显著正相关,但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有效提升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其五,“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国家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特征,个体层面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女性和年长群体、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群体;国家层面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亚太和南亚地区;对低收入国家的正面影响要高于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其六,中美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会显著提升一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和消极感知,但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反而提升了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中美关系的走低、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也会对一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框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对冲倾向

越大,其对中国的评价就越积极;一国若对美国采取追随战略或对中国采取制衡战略的倾向越明显,其对中国态度就越消极。其七“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和政体差异等距离变量和与中美权力变化等体系变量的交互效应会显著弱化这些负面/反向因素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向作用,中国有必要在继续发挥、巩固“一带一路”对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正向作用的同时,继续通过“伙伴关系”“命运共同体”等叙事破解“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等对“一带一路”甚至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和敌意叙事;继续通过规则(规范)重建、关系重塑和语境重构赋予“一带一路”新的话语结构、网络结构和社会结构;有效降低部分国家、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和消极感知,有效提升这些国家、地区、群体与中国的“群我”意识和对中国的认同。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叙事和“威胁建构”会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有必要在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同时,重新框定中美关系、重新解构中美战略叙事,避免让“敌意螺旋”放大中美冲突或实际冲突的规模和程度,避免使中美两个大国成为彼此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他者(重演美苏对彼此的定位),避免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参见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4—132页;张骥、陈志敏:《“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36—52页;袁伟华《权力转移、相对收益与中日合作困境——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为例》,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第39—62页。

② Jonathan E. Hillman, *The Emperor's New Road: China and the Project of the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35; 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31页;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58—78页。

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一文中曾称“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重塑全球经济规则、技术标准和政治体制……从而间接取代美国”。参见 Hal Brands and Jake Sullivan, "China Has Two Paths to Global Domination," *Foreign Policy*, No. 237, 2020, pp. 46—51。

④ 有关软实力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参见徐进:《国家品牌指数与中国国家形象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9—26页;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6—12页;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4—29页。

⑤ 孙英春:《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第33—39页;Chandra Mukerji, "The Culture Power of Tacit Knowledge: Inarticulacy and Bourdieu's Habits,"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Vol. 12, No. 3, 2014, pp. 348—375。

⑥ Michele G. Alexander, Shana Levin and P. J. Henry "Image Theory,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Dominanc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Motives Underlying International Imag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2005, pp. 27—45。

⑦ 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p. 120—131; 杨冬云:《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与国家软实力》,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00页。

⑧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87—203页;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4—134页。

⑨ 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鸣译:《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29页;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9页。

⑩ 实证研究也发现,发达国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更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参见 Yu Xie and Yongai Jin, "Global

Attitudes Toward China: Trends and Correl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y 18, 2021,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21.1926088>,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⑪参见 Erving 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Longman, 1974, p.87; William A. Gamson, et al, "Media Imag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8, No. 1, 1992, pp. 373-393; 托德·吉特林著,张锐译:《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⑫ Michael Mousseau "The End of War: How a Robust Marketplace and Liberal Hegemony Are Leading to Perpetual World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160-196; Katherine Barbieri, *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22-27;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81、208页。

⑬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4—339页。

⑭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李晓燕、薛晓梵译:《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5页;卢凌宇、胡鹏刚:《贸易相互依存、争议问题与国际冲突的复发——“商业和平论”批判》,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第35—69页。

⑮迟永:《中国对外贸易提高了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131-153页。

⑯杨波、柯佳明:《国家形象是软实力吗?——基于跨国并购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4期,第135—155页;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4—28页。

⑰庞琴、梁意颖、潘俊豪:《中国的经济影响与东亚国家民众对华评价——经济受惠度与发展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130—154页。

⑱Jennifer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254; 傅强、袁正清:《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85—155页。

⑲Janice Bially Mattern, *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2; 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6—36页。

⑳迈克尔·福柯著,肖涛译:《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㉑Emanuele Castano, Alain Bonascossa and Peter Gries "National Images as Integrated Schemas: Subliminal Primes of Image Attributes Shape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7, No. 3, 2016, pp. 351-366; Michael A. Olson and Russell H. Fazio "Implicit Attitude Formation Through Classical Condition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2, No. 5, 2001, pp. 413-417.

㉒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00; 罗伯特·席勒著,陆毅莉译:《叙事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V、VI页。

㉓Robert J. Shiller "Popular Economic Narratives Advancing the Longest U.S. Expansion 2009-2019,"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42, No. 4, 2020, pp. 791-798.

㉔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51—79页。

㉕赵一衡:《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叙事与霸权护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138—155页。

㉖Yuan Zhengqing and Fu Qiang "Narrative Fram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 Construction of Rival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20, pp. 33—34; Peter Gries and Yiming Jing "Are the US and China Fated to Fight? How Narrative of 'Power Transition' Shape Great Power War or Peac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4, 2019, pp. 456-482.

㉗有研究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他者化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他者化类似,通过对作为他者的中国和苏联的叙事定位,才能确立美国的“我们”身份,并在“自我—他者”的叙事框架下寻求和建构“我们”的安全感。参见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67页。

㉘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Graham Allison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5, 2017, pp. 80-89.

㉙赵一衡:《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叙事与霸权护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138—155页; J. Lawrence Broz, Zhiwen Zhang and Gaoyang Wang "Explaining Foreign Support for China'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4, No. 3, 2020, pp. 417-452。

③⑩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99-101; 唐世平著, 林民旺等译:《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31页。

③⑪参见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③⑫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STAT Data Center,"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军事支出数据来自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PWT 10.0),"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lang=en>,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③⑬ Pew Research Center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③⑭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merican Public Divided on Cooperation with Confronting China,"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public-divided-cooperating-confronting-china>,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③⑮徐进:《中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的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21—37页;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51—79页。

③⑯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47—77页。

③⑰庞琴:《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第69—96页。

③⑱在美国外交传统中,民主党往往通过意识形态鉴定美国利益,而共和党更倾向于通过外部威胁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威胁评估时,前者受价值观的影响会更多一些,而后者更加注重美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参见王金波:《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56页;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4—50页。

③⑲卢盛峰、董如玉、叶初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

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载《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3期,第80—98页。

④⑩吕越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载《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第187—202页;金刚、沈坤荣:《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载《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第79—97页。

④⑪戴翔、宋婕:《“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链优化效应——基于沿线参与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6期,第99—117页。

④⑫有研究发现,一国对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不满也有可能推动该国向中国靠近并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参见 J. Lawrence Broz, Zhiwen Zhang and Gaoyang Wang "Explaining Foreign Support for China'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pp. 446—447。

④⑬卢锋等:《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第934页。

④⑭实证研究也发现,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密切的经济联系会显著提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参见 Tao Xie and Benjamin I. Page "What Affects China's National Imag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3, 2013, pp. 850-867。

④⑮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49页。

④⑯罗杭、李博轩:《国际结构分析与国家权力测算——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48—82页。

④⑰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83—109页。

④⑱陈冲:《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第120—154页;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4—33页。

④⑲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7页。

④⑳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32—155页;孙忆、孙宇辰:《自由贸

易协定能提升国家间亲密度吗?——基于中国周边FTA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129—154页。

⑤1 乔治·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载德克·盖拉茨编,邵军航、杨波译:《认知语言学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3—204页。

⑤2 傅强、袁正清:《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85—112页。

⑤3 有学者通过对“一带一路”1889个事件的编码和对8类最具代表性案例的一致性分析发现,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时,同时扮演着规则接受者、改革者、打破者和创新者多重角色。参见 Lina Liu "Beyond the Status Quo and Revisionism: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Approache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to the Global Order,"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1, 2021, pp. 88-109。

⑤4 Antony J. Blinker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⑤5 王金波《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51页;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200页;袁正清、李志永、主父笑飞:《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89—203页。

⑤6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lv2.pdf>,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⑤7 Marina G. Duque "Recogniz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3, 2018, pp. 577-592;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第224页。

⑤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202—204页。

⑤9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⑥0 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国华为5G政策的政治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110137页;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6期,第24—55页。

⑥1 有关“权力制衡”“威胁制衡”理论的论述,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36页;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0页。

⑥2 在原数据库中,这一指标的名称为 fav_China,参见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set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⑥3 数据来自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set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⑥4 数据来自 The GDELT Project "GDELT 1.0 Event Database," <https://www.gdeltproject.org>,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

⑥5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

⑥6 The GDELT Project "GDELT 1.0 Event Database," <https://www.gdeltproject.org>,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⑥7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和组织》,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1)》, <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11005/1?code=2>,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

⑥8 自由贸易协定参见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已签协议的自贸区》, <http://fta.mofcom.gov.cn>,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双边投资协定参见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货币互换协议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央行间货币合作》, <http://www.pbc.gov.cn/huobizhengceersi/214481/214511/214541/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⑥9 贸易依存度为一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该国GDP的比例,数据来自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data/>,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投资依存度为一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该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512/20151201223578.shtml>,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STAT Data Center,"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

⑦0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https://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0日。

⑦1 Erik Voeten Datavers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hdl:1902.1/12379>,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2日。

⑦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v5.0)," <https://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MID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2日。

⑧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第45、69页;Karl Gustafsson "Understanding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y-Related Issue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Memory to Forget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2020, pp. 1047-1062。

⑨制度距离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库,取六个子指标的均值与中国均值的差的绝对值来测度一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参见The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https://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距离,本文采用标准化欧式距离测算法来测度一国与中国在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参见Hofstede Insights "Country Comparison Tool," <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政体相似度数据来自美国超党派研究机构体系和平中心数据库,取一国的政体分值(Polity 5)与中国的政体分值的差的绝对值来测度一国与中国的政体距离,参见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Polity 5: Regime Autho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Datasets,"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2日。

⑩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Polity 5: Regime Autho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Datasets,"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2日。

⑪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⑫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失业率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STAT Data Center,"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6日。

⑬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set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⑭研究显示,优势阶层的民众通常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受媒体误导的可能性也较低;亦有研究发现,经济状况越好、教育水平越高的受访民众对中国的评价越积极。参见William H. Sewell, et al, "As We Age: A Review of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1957-2001,"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20, No. 4, 2003, pp. 3-111;宋弘、罗长远、栗雅欣:《对外开放新局面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研究》,载《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1期,第241-262页。

⑮本文以GDELT项目一国对美国事件的Goldstein年度均值来衡量一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数据来自The GDELT Project "GDELT 1.0 Event Database," <https://www.gdeltproject.org>,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⑯Erik Voeten Datavers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27/H73779>, 访问时间:2021年6月10日。有研究发现,一国与美国的外交立场距离越大,越容易被中国的“一带一路”所吸引;亦有研究发现,一国对美国提供的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不满也有可能推动该国向中国靠近并参与“一带一路”。参见温尧、谢蒙莹、陈冲:《“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134—154页;J. Lawrence Broz, Zhiwen Zhang and Gaoyang Wang "Explaining Foreign Support for China'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pp. 417-452。

⑰贸易联系为一国与美国双边贸易额占该国GDP的比例,数据来源于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data/>,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7日;投资联系为一国吸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该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数据来自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 "U. 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Data," <https://www.bea.gov/international/dilusdbal>,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7日;军事联系为一国自美国的武器进口总额的对数值,数据来自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https://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数据来源于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Formal Alliances(v4.1),"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formal-alliances>,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

⑱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69页。

⑲GDP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STAT Data Center,"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军事支出数据来自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0日;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PWT10.0),"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lang=en>, 访问时间:2021年7月17日。为减弱数据的异方差性,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之比均采用小数形式。

⑤在基准回归之前,本文首先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识别策略满足差分估计所需要的平行趋势假设;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政策效应未受遗漏变量的干扰。

⑥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有效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排他性特征和对非自贸伙伴国的贸易、投资、产业转移效应削弱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向作用,而自由贸易协定背后的规则之争、区域合作主导权之争也可能加剧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参见冯帆、何萍、韩剑:《自由贸易协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中的规则之争》,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第118—136页;陈兆源:《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选择——基于外交战略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131153页。

⑦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27—222页;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第44页。

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和中国的经济红利部分对冲、抵消了相对实力变化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经济因素相比,一国对中

国军事、科技实力的威胁感知更加直接和敏感,从而弱化了中美经济实力变化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利影响。参见 Michael Beckley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2, 2018, pp. 7—44。

⑨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问题的建议。

⑩具体计算方法为一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投资依存度、武器进口额(对数值)和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投资依存度、武器进口额(对数值)的差值,数据来源参见前文“数据和变量”部分。

⑪具体计算方法为一国对中国事件的 Goldstein 年度均值减去该国对美国事件的年度均值,数据来源参见前文“数据和变量”部分。

⑫具体计算方法为一国对中国事件的 Goldstein 年度均值和对美国事件年度均值的差的平方,数据来源参见前文“数据和变量”部分。

⑬具体计算方法为一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政体差异、外交立场距离和与美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政体差异和外交立场距离的差值,数据来源参见前文“数据和变量”部分。

C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mprove China's National Image

Wang Jinbo

Abstract: National image is the general presentation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in the global arena. Under the macro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influence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can it improve the perceptions and narrative framing of China by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Based on the Pew Research Center's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2005–2020)surveys, the autho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RI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its mechanism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BRI is correlated with China's national image positivel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pecifically, th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Hirschman effec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rade, investment,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partnership, 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 country's positive assessment of China and its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BRI with cognitive distance variables including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 cultu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diplomatic stances, in addition to the optimiz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BRI on power shift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ffectively alleviate and improv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 country's misperceptions, negative perceptions on China(as a threat)and the dilemma of taking si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the cooperative narrative of BRI and its metaphorical replacement of the competitive or even hostile narrative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soften and dissolve a country's negative reasoning, narrative framing, and identity or emotional antagonism with China.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lay and consolid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BRI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while re-framing Sino-U. S. relations and re-deconstructing the strategic narrative of Sino-U. S. relations.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image; soft power; narratives;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